

林獻堂與梁啟超

(上)

洪桂己

林獻堂敬重梁啟超

早年從事台灣抗日民族運動的本省耆宿林獻堂，和當年致力維新自強運動的梁啟超，曾有一段很不尋常的交往；梁啟超對台灣同胞抗日運動的觀點，曾為林獻堂等所採行。這是我國近代史中值得注意的一頁。

清光緒二十年（西元一八九四年，日本明治二十七年），中國與日本，因朝鮮問題，掀起甲午之戰，結果滿清政府大敗，於次年簽訂馬關條約，中國被迫割讓台灣澎湖予日本。台灣同胞聞訊後羣情悲憤，奔走呼籲無力回天，而抗日運動亦歷久不絕，其間可歌可泣的壯烈事跡，史跡斑斑可考。日本自清光緒二十一年（西元一八九五年）派海軍大將樺山資紀為首任台灣總督，率軍前來侵佔台灣開始，至民國三十四年（西元一九四五年）台灣重歸祖國懷抱為止，歷時五十年。淪陷後的台灣同胞，依舊不忘祖國，在這一時期中，祖國有兩大潮流在激盪，一是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組織，一是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自強維新。關於國父領導革命數度來台，及台

灣同胞在省內及國內參加革命的史實，其波瀾壯闊。「中外雜誌」曾先後連載史學家蔣君章、王成聖等巨構多篇，記述甚詳；茲就較少為人所知的，林獻堂與梁啟超的交往，及台灣同胞自力圖強的一段史實，作一概述。

馬關議和時的梁啟超

梁啟超，初字卓如，任甫，又改任公，別署新民子，哀時客、滄江、飲冰室主人等。他是廣東省南海縣新會人。生於同治十二年癸酉（西元一八七三年）正月二十六日，卒於民國十八年己巳（一九一九）一月十九日，年五十七。自幼聰慧過人，四、五歲時，就其父母讀四書和詩經，九歲已能寫千言文章，十二歲應試學院，補博士弟子員，十七歲中舉人，但會試未及第。

其後入阮元所辦的「學海堂」，專攻訓詁學。年十八，入南海康有為之門，在廣東長興里的「萬木草堂」，學公羊傳、朱子學、古禮之外，並研究周秦諸子、佛典、經濟以及西洋學問等，深受康有為的影響。甲午中日戰後，力倡維新變法之說，在北京結識夏曾祐、譚嗣同等名士，

並在上海創刊「時務報」，著「變法通議」，鼓吹民權思想。

光緒二十年，中日爆發「甲午之戰」，清軍敗績，翌年，清廷派李鴻章為全權代表，赴日本，在馬關（今之下關）跟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議和。

馬關和議，對於當時的清廷來說，或出於不得已，但為整個中國前途而言，實在是一種無上的屈辱。消息傳出，全國譁然，無不感到中國的積弱，已經到達極點，大家應該力圖挽救，奮發圖強，使中國保持獨立。

這時，梁啟超正是血氣方剛的二十二歲青年，他於乙未（光緒廿一年）春入北京，赴會試。恰逢和議正在進行中。他在「三十自述」中說：

「甲午年廿二，客京師。於京國所謂名士者多所往還。六月日本戰事起，惋惜時局，時有所吐露。人微言輕，莫之聞也。顧益讀譯書，治算學、地理、歷史等。明年乙未，和議成。代表廣東公車百九十九人上書陳時局，既而南海先生聯公車三千人上書請變法，余亦從其後奔走焉。」

「梁任公先生大事記」亦謂：

「乙未公車上書，請變法維新。倡之者康南海，而先生奔走之力為多。割臺議起，先生聯同順德麥孟華、香山張壽波、增城賴際熙，上書都察院，請代奏，力言臺灣萬不可割，格不得達，三君皆公車報罷者。」

又「南海自編年譜」云：

「正月還粵，二月十二日偕卓如、梁小山入京。……時旅順已失，朝廷震動，命戶部左侍郎張蔭桓及前巡撫邵友濂往日本請和。日本以非全權不受。再命大學士李鴻章求和，議訂割遼、臺，並償款二萬萬兩。三月二十一日電到北京，吾先知消息，即令卓如鼓動各省。先鼓動粵中公車上摺，拒和議。湖南人和之。於二十八日粵、楚同遞，粵士八十餘人，楚則全省矣。與卓如分託朝士鼓各直省，莫不發憤，連日并遞章滿都察院，衣冠塞途，圍其長官之車。臺灣舉人，垂涕而請命，莫不哀之。時以士氣可用，乃合十八省舉人於松筠庵會議，具名者千二百餘人，以一晝二夜，草萬言書，請拒和、遷都、變法三者，卓如、孺博書之，并日繕寫，徧傳都下。士氣憤湧，聯軌察院前里許。至四月八日遞，則察院以既已用賈，無法挽回，却不收。」

梁任公「戊戌政變記」第一章：

「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，出則無敵國外患者，國恆亡。信乎言哉。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，實自甲午戰敗，割臺灣、償二百兆以後始也。」

梁任公戊戌政變記附錄一改革起源：

「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，實自甲午一役始也。……乙未二、三月間，和議將定。時適會試之年，各省舉人集於北京者以萬數千計。康有為創議上書拒之，梁啟超乃日夜奔走，號召連署上書論國事。廣東、湖南同日先上。各省從之。各自連署，磨集於都察院者，無日不有。雖其言或通或塞，或新或舊，駁雜不一，而士氣之稍申，實自此始。……

細讀以上各節可知梁啟超對於和議割臺事，曾極力反對。無奈當時清廷腐敗，無法挽救，終於依據和約條款，將臺灣割讓日本。因此留給梁啟超很深刻的印象，使他無時無刻，不懷念臺灣。後來，他寫文章、演說，時時提到臺灣的事情。

梁啟超在「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」中說：

「新史氏曰：我國有不世出之英雄鄭延平，憑藉無置錐之地，而能奪四萬方里之臺灣於當時炙手可熱之荷蘭人之手，傅子孫三世，延將斬之明祀四十餘年，而卒後迄今數世紀，稱道者絕希焉。直至最近數年間，其人物之價值，始漸發見。」

字裏行間，不但關心臺灣，尤且對於臺灣的歷史，充滿了非常的民族情感。

以後梁啟超認識了林獻堂，對於林獻堂日後抗日的民族運動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。

林獻堂的出身與家世

光緒七年十月二十二日，林獻堂出生於當時隸屬福建省台灣府彰化縣阿罩霧莊，即現在的台中縣霧峯，他的族兄林朝棟曾於劉銘傳時代平定反抗量丈土地的施九段有功，林家在中部台灣是擁有一千多甲土地的大地主，他的父親林文欽為前清舉人，林獻堂出生那一年，正值法國出兵侵略安南時刻，名將劉永福率黑旗軍、林獻堂的族兄林朝棟率鄉勇拒法軍於獅球嶺（今基隆）。光緒廿一年台灣淪陷那年，林獻堂十五歲，一家四十餘口避難逃到泉州，那時泉州鼠疫流行，死亡枕藉，台灣烽火未熄，交通梗阻。翌年返台與彰化望族楊晏然之長女楊水心結婚。光緒廿六年二十歲那一年，父親允卿先生（即文欽）在香港猝逝，林獻堂赴港奔喪，並順道視察在港之樟腦生意。光緒廿八年出任霧峯區長，二十五歲組織台灣製麻株式會社，雖處在異族統治之下，然以一青年才俊在台灣社會漸露頭角。

由於梁啟超在乙未年率千餘舉人公車上書諫阻割台，又因推動百日維新，早已成為台灣人民仰慕的對象，因此光緒卅三年，林獻堂二十七歲的時候，第一次赴日本遊歷，便在日本奈良旅舍邂逅並與訂交。

台大教授黃得時先生曾有一篇很精彩的「梁任公遊台考」刊載於台灣文獻專刊上。這一篇專論與現存國史館之日本外務省檔案所記載頗相符合。謹摘錄如下：

梁任公由於戊戌政變失敗後亡命日本之前，他所寫的文章，已風靡一世。當時的臺灣，雖然在日本統治之下，但是對於任公的著書及報紙並

沒有禁止進口，所以臺灣人之中，稍爲前進的，莫不受其思想和文章的影響。其中，如臺中林獻堂先生及其族侄林幼春先生以及樸社（臺中詩社）諸人，都非常欽慕任公的大名，尤以林幼春先生對任公的道德文章，至爲傾倒，居常每以有機能認識任公爲快事。

林獻堂先生終於光緒三十三年丁未（日本明治四十年，一九〇七）三月，遊日本東京，六月由東京歸臺，途次奈良時，於某旅館邂逅任公遂與之訂交。當日，他們一見如舊，話談得非常投機。據葉榮鐘先生所編「林獻堂先生紀念集」中的甘得中先生之「回憶錄」，敘述當日的情形如下：

「民前二年（按「紀念集」作五年，二年係甘氏誤記），翁（按指林獻堂先生）偕舍侄盛昌及余赴日京。某日訪任公先生於橫濱新民叢報館，迄無要領。轉往大同學校晤林儒校長，告以來意。林氏謂：任公不在這裏，請向神戶同文學校問湯覺頓校長。

「歸途游奈良，寓某旅社。時既薄暮，細雨霏霏，余翻閱旅社登記簿，有三位祖國人在焉。曰潘博、陳筍筍，餘一位忘其姓名。知陳氏爲新民叢報發行人，必知梁先生現在何處。即詢下女，偕上三樓。至廊下，囑下女持片入請。她云不必。正在談話間，室內突走出一位，問何事，答以我臺灣人，欲知梁任公行踪於潘、陳二君。那位又問：你找他何事？余說：素讀他文章，久懷仰慕，冀一識荆耳。那位乃相揖入坐。即曰：我即梁啓超也。聞之喜極。乃云有位先輩，現在二樓，即邀與俱來。

梁啓超的痛語和妙喻

「及會晤時，潘、陳二氏在旁，各打招呼。翁即出林儒氏之紹介信。繼云：我們處異族統治下，政治受差別，經濟被榨取，法律又不平等。最可悲痛者，尤無過於愚民教育。處境如斯，不知如何而可？先生答稱：三十年內，中國絕無能力可以救援你們，最好效愛爾蘭人之抗英。在初期愛人如暴動，小則以警察，大則以軍隊，終被壓殺無一倖存。最後乃變計，勾結英朝野，漸得放鬆壓力，繼而獲得參政權，也就得與英人分庭抗禮了。乃舉例說：英國漫畫家繪兩位愛爾蘭人，以一條繩索各執一端，將英首相絞殺。這意味着愛人議員在英國議席不多，但處在兩大黨之間，舉足輕重，勢固得以左右英內閣之運命。你們何不效之。我們聞之，真是妙不可言，自是銘心印腦。」

「繼續先生來臺一遊，梁先生曰：我早有此想，因曾聞後藤新平（按曾任臺灣民政長官）說：臺灣如何進步，極事鋪張，且云非如李鴻章所謂臺灣人強悍難治也。果如後藤所說，將來或可爲我借鑑。」

「翁繼云：大駕如果光臨，必請日本中央政府顯要爲先生紹介。蓋日人深忌我們與祖國人士接觸。先生領之。」

「當夜之談，余爲翻譯，國語既不大高明，而先生廣東腔之國語，亦實難懂。間雜以筆談，先生筆鋒銳利，議論雄偉，見識卓越，固非尋常者所能企及，況我們耶。真有小巫見大巫之感。」

感。」

「先生初落筆則曰『本是同根，今成異國，滄桑之感，諒有同情……今夜之遇，誠非偶然……』余惜未能記憶，記這幾句，其傷時懷世之情感，早已動人，幾使我們爲之淚下。」

林獻堂臨別，特請任公將當日筆談之底稿攜回，以便轉示族侄林幼春一閱，任公點首稱善。上面係林獻堂先生和甘得中先生與梁任公初見面時的情形。據「紀念集」編者葉榮鐘先生說：

「梁任公與林獻堂先生初見面一夕話，不但影響林獻堂先生個人之思想與行動，間接亦決定臺人政治運動採取溫和之路線，以當時日人在臺灣政治力量之強大，與夫臺灣地理之特殊環境而言，臺人之政治運動，必不容有流血革命之出現，即使出現，亦必無成功之可能。然非任公之眞知灼見，掬誠相告，則臺人爲爭取自由，或不免多所犧牲也。」

吾人當觀其後，民國二年之苗栗事件，暨民國四年之礁吧呷事件，羅福星與余清芳，均受辛亥革命之影響，而從事武力反抗，然皆敗死，而後者又株連無辜且數千人，後果之慘痛，令人觸目驚心，益見任公所見之遠與謀事之忠，無怪（林獻堂）未嘗須臾忘懷也。」

戴季陶英雄所見

又據甘得中先生說：渠於民國二年在東京時，因震於革命元勳戴天仇之威名，曾得板垣退助伯爵之介紹，而晉謁傳賢（即天仇）先生，痛陳臺人處境之慘狀。戴告之曰：祖國現因袁世凱行將

竊國，帝制自爲，現爲致力討袁，無暇他顧。滅袁以後，仍須一番整頓，故在十年以內，無法幫助臺人，而日本乃未經民權思想洗禮之國家，視革命運動如洪水猛獸，絕無同情，君等與革命黨人來往，必受壓迫，未見其利，先受其害。爲君等計，可先覓門徑，與日本中央權要結識，獲得日本朝野之同情，藉其力量，牽制臺灣總督府之施策，以期緩和其壓力，俾能減少臺灣同胞之苦痛。戴天仇對臺灣之見解，不期竟與任公吻合。可謂英雄所見略同。而兩位先覺，對後輩指導之親切，與籌謀之周密，真有披肝瀝膽之概矣。

要之，梁任公對於當時在臺灣醞釀中的政治運動，勸告採取溫和的方法。林獻堂先生深受其影響。以後以林獻堂先生爲中心所發動的一連串社會文化運動，亦皆採取此溫和方式，與日人作合法的搏鬥。所以日人對此亦無可奈何。

林獻堂先生在奈良邂逅梁任公之事，回臺後，即告訴其族侄林幼春先生。幼春先生即於六月十五日，寫信給梁任公，全文如下：

「海島羣民幼春。謹啓

任公先生執事，幼春生年十六，罹滄桑之變，淪胥于此十有三年，年廿八矣。每念檻猿囚鶴，輒欲破壁飛去，而舉族百餘，戀於鴛鴦，握拳嚼齒，憤無可伸。咄咄終日，如有心疾。當南海先生受知之年，雲興霞蔚，天下企踵。幼春竊竊私喜，以爲祖國中興，我海島之民，其有後來其蘇之一日也。倭臣貪祿，釀成此朝。南海先生與先生同時去國，斯時心灰望絕。每閱報紙，淚

不覺其承睫也。臺灣蠻鄙之鄉，聲化素隔，略識文字，已成鳳毛，雖爲血氣之倫，實同毛角之族。淪胥已來，務爲繭絲之政。其黠者，狐媚百端爲之伎，以求免於禍，其愚者，魚肉唯命，鼎俎是甘。加以學校程度甚低，開化無期。生計之途日窘，謀食不易，此島利藪，向以米糖茶棧（即樟腦）爲四大宗。今其三，已奪於政府外商之手。唯農一道，尙足資生。而國賦之外，別有常供什一之征，不啻四倍，雖至愚者，亦知溝壑不免。其稍有知覺者，能不及汲汲顧影乎。大抵天演之世，受制外族，大率如此。印度越南，已成前轍，無俟含淚隕血，向先生喋喋也。

先生救國之誠，薄海同欽，再造玄黃，必有成算。如或憫此一方，游轍南指，引繩批竅，爲之導迷，則墮斧之徵，雖碾骨爲塵，尙能爲厲也。家叔東遊，歸亟云，於途次曾拜几席，並有渡臺之約，不禁距離二百。今茲冒瀆，惟先生憐其頑愚，有以教之。割臺後之第十三年六月十五日頓首白。」

由於此信，我們可以知道林幼春先生寫此信的時候，臺灣割日已經十三年（光緒三十三年丁未，日本明治四十年一九〇七），幼春先生正是一位年方二十八歲的青年。他非常痛恨日本的統治。尤其是對臺灣人的前途，備極關心，其反抗意識以及對自己民族的熱愛，溢於字裏行間。而最後不願用日本的年號，特意寫「割臺後第十三年」，表示他對於祖國有多麼念念不忘的強烈情意。

贈林獻堂林幼春

宣統二年庚戌（日本明治四十三年，一九一〇年），即梁啓超遊臺前一年秋天，林獻堂先生率長公子攀龍（十歲）、次公子猶龍（九歲）往日本東京就學，歸途到神戶須磨浦的雙瀟園，再度訪晤梁。當時，梁作「贈臺灣遺民林獻堂（此三字飲冰室文集作某）兼簡其從子幼春七古長詩」一首，自此林獻堂與梁啓超之間的交往已入莫逆之交，梁啓超在日本化名吉川晉，他研究日本明治維新，又注意淪陷十七年後的台灣已能自給自足，剛好在宣統年創立「國風報」刊載有關台灣的政績，於是對日本統治下的台灣發生興趣，並且想和離開祖國懷抱十七年之久的同胞見見面，灌輸些民族意識，捐募些資金，以便在北京和上海創辦報紙。關於這些事情，梁啓超於宣統三年（民前一年，日本明治四十四年，一九一一）陰曆二月二十六日，從笠戶丸門司舟次所發「遊臺第一信」裏，講得非常詳細。內容如下：

「編輯部（按國風報）諸君鑒：僕等以二月二十四日成行矣。茲遊蕃志五年，今始克踐。然幾止者且屢，若再荏苒，則彼中更炎歛不可住，又當期諸一年以後。故毅然排萬冗以行。首塗前蓋數夜未交睫也。

吾茲行之動機，實緣頻年居此，讀其新聞雜誌，盛稱其治臺成績，未嘗不愀然有所動於中。謂同是日月，同是山川，而在人之所得，乃如是也。而數年以來，又往往獲交彼中一二遺老，則所聞又有以大異乎前，非親見，又烏乎辨

之。此茲行所以益不容已也。大抵茲行，亟欲調查之事項如下：

一、臺灣隸我版圖二百年，歲入不過六十餘萬。自劉壯肅以後，乃漸加至二百餘萬。日人得之僅十餘年，而頻年歲入三千八百餘萬。本年度預算且四千三百萬矣。是果何道以致此，吾內地各省若能效之，則尚何貧之足為憂者。

二、臺灣自六年以來，已不復受中央政府之補助金。此四千餘萬者，皆臺灣本島之所自負擔也。島民負擔能力，何以能驟進至是？

三、臺灣政府前此受其中央政府補助數千萬金，又借入公債數千萬金。就財政系統言之，則臺灣前此對於其母國，純然為一獨立之債務國，今則漸脫離此債務國之地位矣。此可謂利用外債之明效大驗也。吾國外債可否論，方喧於國中，吾茲行將於茲事，大有所究索。

四、臺灣為特種之行政組織，蓋沿襲吾之行省制度，而運用之極其妙也。吾國今者改革外官制之議，方曉曉未有所決，求之於彼，或可得師資一二。

五、吾國今後言殖產興業，要不能不以農政為始基。聞臺灣農政之修，冠絕全球。且其農事習慣，多因我國。他山之石，宜莫良於斯。

六、臺灣為我領土時，幣制紊亂，不可紀極。日人得之，初改為銀本位。未幾遂為金本位。其改之次第如何，過渡時代之狀態如何，

改革後之影響如何，於我國今日幣制事業，必有所參考。

七、日本本國人移殖於臺灣者，日見繁榮。今日我國欲行內地殖民於東三省、蒙古、新疆諸地，其可資取法者必多。

八、臺灣之警察行政，聞與日本內地系統不同。不審亦有適用於我國者否。我國舊行之保甲法，聞臺灣采之而卓著成效。欲觀其辦法如何。

九、臺灣之阿片專賣事業，自翊為禁煙之一妙法，嘗有可供我研究者。

十、臺灣前此舉行土地調查，備極周密。租稅之整理，其根本皆在於此。何以能行，而民不擾。又其所行之戶口調查，係適用最新技術，日人自誇為辦理極善。今者日本本國，將行國勢調查，即以爲法，欲觀其實際詳情如何。

吾茲游所調查之目的略如右。其他則俟臨時當更有所觸發也。首途以來，入夜必爲游記，歸後當更布之。或亦吾國治政聞者，所急欲觀乎。舟次百不備，文蕪不可讀，惟亮察。」

由以上任公所舉的十項，可知任公對於日人的治臺成績，期待非常殷切而廣汎，決非一個普通的觀光遊客可比。

任公除了上述的目的之外，還有一個目的，就是爲辦報館募款。原來，好幾年以來，任公的黨內同志，提議創辦日報。所以任公計劃創辦「北京日報」和「上海日報」。

梁任公於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致南海先

生一書，有原注云：

「前日爲臘月廿五日，方從東京返神戶，正月初八東京社員開新年會，又必須往，往則最少須六七日。又欲往臺灣籌款，奈何奈何。」

又同月二十九日梁任公致徐佛蘇書又云：

一、經費：此間有蒙商吳觀堂者，每年捐一萬元，其開辦費現雖無着，尚有臺灣林君者，亦熱心故國而崇拜吾黨，弟擬親往運動之，當有所得。

又宣統三年（任公於此年春遊臺）二月十五日致佛蘇書亦說：

「……僕頃欲籌十萬金，辦兩報館（原註：以七萬辦滬報，以三萬辦京報）。今雖未有眉目，然可希望者數處，日間將爲臺灣之遊，亦爲此事（原註：公若三月末來最妙，否則恐吾往臺也……）」

由於上面，可知梁任公對於遊臺籌募資金之事，寄與莫大的期待。

早春來遊舊河山

梁任公的遊臺，是宣統三年辛亥（民前一年，日本明治四十四年，一九一一）二月二十四日（陰曆），乘笠戶丸由日本神戶啓程，二十八日抵達基隆港。同行的有湯覺頓字明水，號荷庵（後任中國銀行總裁），及任公長女令嫻。

當時，任公是住在神戶附近海邊名叫須磨浦的雙濤園。首途時，因爲繁櫻正在滿開，令嫻以辜負一年花事，大有依依不捨之感。任公賦其事云：

我生去住本悠悠，偏是逢春愛遠遊。
歷劫有心還惜別，櫻花深處是并州。

此詩載在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藝苑欄，轉結作「稍惜櫻花時節過，一團絳雪望中收」，後經四川名學者詩人趙堯生刪定如上。

二十五日，舟泊馬關（今之下關），任公曾到「春帆樓」憑弔。春帆樓是甲午中日戰爭，清軍敗後，乙未年（光緒二十一年，一八九五）三月，清廷派全權大臣李鴻章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簽訂條約的地方。該條約，將臺灣及澎湖割讓日本，史稱「馬關條約」。梁啓超撫今追古，萬感交集。賦詩如下：

明知此是傷心地，亦到維舟首重回。
十七年中多少事，春帆樓下晚濤哀。

這首詩所用的「傷心地」三字，原來是由於吳摯甫把「春帆樓」，榜曰「傷心之地」而來的。梁在基隆登陸時，「遺老歡迎者數十」旋受林獻堂、連雅堂及甘得中先生等陪同，乘車往臺北

台北五日關心庶政

梁任公到臺北火車站受遺民熱烈的歡迎。當晚投宿於「日之丸旅館」，也就是光復後在信陽街四號的新生總社。

梁啓超在臺北一共勾留五天，非常忙碌，連休息的時間都沒有。他除到總督府各局所，調查日本統治臺灣的情形及與遺老們相晤對之外，還要觀察市街的建設。

梁啓超認為臺灣的官吏，非常尊大，言之極

準。日據時代有人說：來臺灣的日本人，不是做官，就是經商。其中做官的，有權有勢，所以成為官吏的王國。

梁啓超在臺北時，臺北城壁已拆毀，只賸下四門。梁平素非常崇拜劉壯肅（劉銘傳），眼見劉壯肅駐臺時所建設的城牆全部被拆毀，不禁感慨萬千。梁曾說：

「劉壯肅所營故城毀矣。留其四門，以作紀念。今屹然於西式聖室與東式木屋之間。日過其下，劇心怵目。故撫署（撫台衙門），今為總督府（當時總督府在今中山堂舊址），吾曾入之……。」

梁有「臺北故城毀矣，留其四門」一首如下：
清角吹寒日又昏，并幹烽櫓了無痕。

客情冷似秦時月，遙夜還臨景福門。
梁啓超在臺北時，適逢市區改正。日本政府拆毀民房，建設新的道路，當時日本統治者無視民間痛苦，強制執行，使無家可歸之人，非常之多。此事，在「贈臺灣逸民林獻堂兼簡其從子林幼春」那首長篇古詩，亦有提及。

梁任公在臺北只有勾留五天，可是其銳利的眼光，已經看破了當時臺民房屋被拆毀的痛苦。其描寫之深刻動人，堪與杜甫的「石壕吏」相媲美。

在台北講演與答詩

梁啓超遊臺消息，早由林獻堂先生發表。據漢文臺灣日日新報（明治四十四年陽曆三月二十八日）的「編輯日錄」說：

「頃接林獻堂氏來函，謂梁任公欲至臺島觀光。二十四日經搭笠戶丸出發。同行者為湯覺頓君及其令愛。擬於二十七日即馳往歡迎，並邀集該地有志者盡地主之誼，而表欣慕之心云云。聞此外，尚有專函達知洪以南，李漢如兩氏，藉重其周旋。」

這裏所說的洪以南是當時瀛社的社長，而李漢如為臺灣日日新報的漢文記者。上面的消息在日日新報登出，凡是經常讀梁啓超的文章的人士，當然用不着說，連沒有讀過梁的文章，只聞梁啓超大名的人，也莫不以滿腔的熱忱，等待梁的來臨，一瞻其丰采。終於三月三日（陰曆）晚在臺北遺老百餘輩，設歡迎會於臺北故城之薈芳樓（即東薈芳）。當日情形，據梁啓超三月三日由日之丸旅館所發「游臺第三信」說：

「遺老之相待，有加無已。自願何以當此。昨日乃集百餘輩，大設歡迎會於臺北故城之薈芳樓。吾席間演說之辭，真不知如何而可。屬耳在垣，笑掣皆罪耳。他日當以入遊記，此弗述也。」

由上面的敘述，可知當晚梁的演說，實在真不知如何是好。甘得中先生的回憶錄亦說：

「翌日晚（三月三日）在北臺人有志及華僑開歡迎會於東薈芳旗亭。是會也，日官民無一人參加，而偵探特務四伏矣。翁（林獻堂先生）毫不畏縮，起述歡迎辭，繼而任公致謝詞，兼作一小時之講演。因隔窗有耳，辭意委婉，非細味之，不能知其底蘊。」

當日梁所作講演，內容如何不得而知。梁經

常演講，都有保存底稿。獨於此次演講，隻字不留。這可能是由於梁啓超有所顧慮。當夜參加歡迎會的，都是在臺北一流的文人騷客，以及一些思想較爲進步的人士。梁賦長句四首答謝，其中一首如下：

側身天地遠無歸，王莽生涯似落暉。
花鳥向人成脈脈，海雲終古自飛飛。

梁啓超對於臺中建省城未就一事，亦賦五言一首，見「臺灣雜誌」之中，該詩如下：

蕩蕩臺中府，當年第一州。桑麻隨地有，城郭入天浮。

江晚魚龍寂，霜飛草木秋。斜陽殘堞在，莫上大墩頭。

梁自註云：「劉壯肅本擬建臺中爲首治，築城工未蕪而去位，今城亦毀，移城門一角於大墩頭公園」。

到霧峯梁林深談

梁啓超旋受霧峯林獻堂的邀請，從三月八日起下榻於萊園的五桂樓。其間，梁與中部諸父老講學論世，詩酒唱酬，甚爲融洽。跟林獻堂所談的，多半是有關臺灣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教育以及民間解放等問題。至於其所談內容，因在日人監視與壓迫之下，無法公開發表。無法得知當日所談者爲何事。據追隨林獻堂多年的葉榮鐘所寫「梁任公與臺灣」一文中略謂：

(任公)到霧峯的第二天，他對灌老(林獻堂)和幼春先生勸告，叫他們不可「以文人終身

」，須要努力研究政治、經濟以及社會、思想等學問，並即席舉筆開列日本書籍三十餘種(大部份是由歐文翻譯的)，以後又陸續開列，計達一百七十餘種，都是東西的名著。同時他將自己發明的一套「日文拾讀法」，耳提面命地教給灌老和幼春先生。那套拾讀法，據說是拾讀日文中的漢字，而對日文的假名字，予以公式化，以判斷其文意是否定或是肯定的。但此種方法，僅可應付漢文調的日文，對於純粹的日文，就無法應用。聽說後來任公自己也認錯了。(以上有關梁來臺以後的情形，全係林幼春對葉榮鐘口述的)。

梁啓超在「論學日本文之益」一文中，曾提及日文漢讀法，大意如下：
有學日本語之法，有作日本文之法，有學日本文之法。三者分別言之：學日本語者一年可成，作日本文者半年可成，學日本文者數日小成，數月大成。余之所言者，學日本文以讀日本書也。日本文漢字居十之七八。其專用假名，不用漢字者，惟脈絡詞及語助詞等耳。其文法常以實字在句首，虛字在句末，通其例而顛讀之，將其脈絡詞語助詞之通行者標而出之，習視而熟記之，則已可讀書而無窒礙矣。余輯有和文漢讀法一書，學者讀之，直不費俄頃之腦力，而所得已無量矣。此非欺人之言，吾同人多有經驗之者。此爲已通漢文之人言之耳。若未通漢文而學和文，其勢必至顛倒錯雜齷齪而兩無所成。(中略)日本與我，唇齒兄弟之國，必互泯畛域，協同提攜，然後可以保黃種之

獨立，杜歐勢之東漸。他日支那日本兩國殆將成合邦之局，而言語之互通，實爲聯合第一義焉。故日本之志士，當以學漢文漢語爲第一義。支那之志士，亦當以學和文和語爲第一義。(見飲冰室文集)

梁啓超對林獻堂、林幼春的勸言，均出於梁本身的經驗。尤其是勸告他們不可「以文人終身」，須要努力研究政治、經濟以及社會、思想等學問，是出於梁啓超的理想，也是梁一生的寫照。今日批評梁的人，均說梁啓超的學問及其思想，範圍過於廣泛，對於任何問題的探求，不夠深度。所以當做一個文化運動或啓蒙運動的人物來看梁，梁的確是近代中國一位影響力最大的人。但是如果把梁當做一個文人，或學者來看，不一定是最有成就的人。因爲梁不能「以文人終身」。無論如何，梁勸林獻堂不可以文人終身，立即影響到林獻堂日後獻身於社會運動，從事於民族解放鬥爭，却是事實。

日本官方的偵伺

關於林獻堂與梁啓超的交誼，臺灣總督府不斷加以偵察。表面上，雖然無可奈何他們，但是暗中不斷注意他們的行動。茲據「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」第二編「領臺以後之治安狀況」中卷「臺灣社會運動史」第一章第二節第一「中部本島人之策動」項下，有下列的記載：(譯文)

「原來，本運動(同化會)的先驅者臺中廳直轄阿罩霧(即霧峯)庄廳參事林獻堂，爲清末長髮賊亂殉難忠臣林文察的後裔。其門閥冠絕

全島三路。林猷堂係此阿罩霧林家的一族，與其同族林烈堂在本島人中很有名望。平素很翹望本島人伸張權利，並暗中企圖促進此機會的成熟。適於明治四十二年（宣統元年一九〇九），其實，是明治四十年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），渠到日本內地觀光之際，在奈良市，與中國亡命政客梁啓超邂逅，聽其說有所啓發。爾來敬慕啓超，互通書信。至翌年明治四十四年四月下旬（其實上旬）突然接到梁啓超度臺之電報。猷堂立即到基隆埠頭迎接，並相伴返宅，滯留二星期。此間，梁披瀝自己之抱負，引世界之亡國埃及、印度、安南等爲例，極力鼓吹民族主義。猷堂聞之，頗受感銘云。其後，到大正二年五月（民國二年一九一三），猷堂遊中國，在北京訪問梁氏，由其介紹，得面識中國要路之大官及政客。」

以上係臺灣總督警務局所編官方文獻的記載。內容大體正確。可見日本官方，對梁之來臺，非常關心，最怕是對臺民鼓吹民族思想。

梁啓超下榻萊園五桂樓，除與林猷堂交談有關政治、經濟、教育以及民權、民族問題以外，又於清明後一日（古曆三月九日）同湯荷庵及林癡仙、林猷堂、林幼春、陳槐庭，夜宴於霧峯之萊園。

梁啓超正在沉醉於萊園的風光之時，突然發生一件梁本身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。那就是「神州日報」報導梁啓超遊臺，是受臺灣總督府的招請，並說將爲其歌功頌德。梁啓超看到由日本寄來的剪報，大爲懊惱而憤抑。

原來，梁啓超的遊臺，是蓄志五年，始見實現。絕對不是一朝一夕，突受臺灣總督府招聘而成功的。而且理智如梁那樣高明，民族性如梁那樣堅強，爲甚麼會受日人之籠絡懷柔，而爲其歌

功頌德呢？難怪梁懊惱而憤抑。對於以上「神州日報」惡意中傷，梁啓超立即寫了「與上海某某等報館主筆書」，刊登「國風報」第二年第八期，以示抗議。

粵海舊聞錄

祝秀俠 著

上下册合售一二〇元

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，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、康有爲、梁啟超、蘇東坡、王陽明、李鴻章、梁鼎芬、胡漢民、汪精衛、蘇曼殊、陳璧君、朱家驊、梁寒操、葉公超、章太炎、王寵惠、張作霖、張學良、蔡公時、黃晦聞、湯覺頓、馬超俊、丘逢甲、陳辭修、俞鴻鈞、張蔭麟、陳濟棠、龍濟光、史堅如、孫科、廖仲愷、徐宗漢、傅秉常、張競生、劉思復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，趣談二百多篇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美不勝收上冊 60 元下冊 70 元合售 120 元郵撥 140 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三國人物新論

祝秀俠教授著

定價柒拾元

本書爲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精心傑作，析論三國人物，精采百出，美不勝收。要目有：論諸葛孔明、劉備、曹操、孫吳、董卓、袁紹、關羽、魯肅、顧雍、司馬懿、曹丕與曹植、荀彧、孔融、禰衡、周瑜、田疇、蔣琬、譙周、蔣幹、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「論諸葛亮」，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，篇篇引人入勝，嘆爲觀止。定價台幣柒拾元郵撥 14044 中外雜誌社帳戶。